

·中华再造善本提要选刊·

宋刻唐人文集(三)

李 致 忠

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三卷 (唐) 韩愈撰 (宋)文说注 王俦补注 韩文公志三卷 宋刻本(卷十二至十八配另一无注宋刻本)。框高21.6厘米,宽15.4厘米。每半叶十行,行十八字,小字双行同,白口,左右双边。

韩愈(768—824)字退之,自称郡望昌黎,世称“韩昌黎”。唐河南河阳(今河南孟津县南)人。唐德宗贞元八年(792)擢进士第。幼孤,由嫂抚养。及长,博通六经百家之学。工诗文,自成一家,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人物。喜奖掖后进,经其指点者,皆以韩门弟子自许。董晋镇宣武,辟为巡官。汴军乱,依张建封,鲠言无所忌,调四门博士,迁监察御史。上疏极论宫市,德宗怒,贬阳山令。宪宗元和元年(806)迁国子博士。五年为河南令。八年为比部郎中。九年为中书舍人。十二年进刑部侍郎。元和十四年帝遣使迎佛骨入禁中,愈上表极谏劝阻,贬潮州刺史,改袁州。后召拜国子祭酒,转兵部侍郎,又以兵部侍郎为京兆尹。卒谥“文”,故又称“韩文公”。

韩愈之文正如时人赵德为其所写《文录序》中所说:“其文高出,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,所履之道则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、孔、孟轲、扬雄所授受,……以是光于今,大于后,金石焦烁,斯文灿

然。”故乃为唐宋八大家之首。

历来注释韩文者众，宋人文说、王侔注和补注的韩文，算是比较早而且比较有价值的注文。文说字词源，普慈（今四川乐至）人；王侔字尚友，武信（今四川遂宁）人。两人均属四川籍。此本卷首有绍兴己巳（十九年，1149）文说序及乾道二年（1166）进书表。表明了他们详注韩文是在南宋初年，并在孝宗乾道二年表进于朝。因而此书之刻必在南宋初期以后。

观此书的字体刀法、版式风格，带有浓重的蜀刻特点，但与现存宋蜀刻唐人文集的十一行本系统和十二行本系统，又都不一样。此本版心下端镌刻有大量刻工姓名，如张昌、李正、杨定、张德先、史丙、王公济、王龟、田正二、文望之、文来、单回、单全、单太、单定、姚明、杨先、杨炳、王胜、张已孙、单召、吕道、宋正、宋真、王承、马行等，不胜枚举。刻工姓名本是为了明确记录某版刊工的刻字责任，以便计酬或进行奖惩。但刻工镌雕自己的姓名并没有一定的规范，尤其是群体刻工共同镌雕一书时，彼此都相互熟悉，故镌名时便真、行、草各体都有，阴文、阳文并用，甚至只镌自己姓名中的一两个字，并随意简化字体，可有时又在自己姓名之上精雕细刻一个鱼尾。这些现象在此书中均有所表现。书中不同版叶多次出现刻工“史丙”之名，有一处还镌成“眉史丙”字样，这很值得注意。“眉”很可能是四川眉山的简称。国家图书馆所藏宋眉山地区刊本《淮海先生闲居集》卷一首叶版心下端就镌刻着“眉山文中刊”字样，因而联想到“眉史丙”，盖亦是“眉山史丙”之意。又如南宋宁宗庆元五年（1199）成都府学所刻《太平御览》，版心下端镌有“成都杜俊”字样，与前述“眉山文中刊”、“眉史丙”属同一种形式。这里的成都、眉山、眉，其意都应该指的是刻工的籍贯。特别是《太平御览》所出现的刻工姓名中，也有单回、张昌、王龟、宋正等人，而且所镌刻的姓名也是真、草、行各体并出，阴阳文并用，规范字与缺笔少画、俗简体字并存，刻工姓名上面有时也雕个鱼尾。似乎成了

这一地区镌雕刻工姓名的一大特色风格。由此不难判断，文谔详注经进的这部《昌黎先生文》，当也是南宋中叶四川成都眉山地区的刻本。但不是宋蜀刻唐六十家集的丛刻本。

书中补配的七卷白文本《昌黎先生集》，观其字体刀法、保留下来的刻工姓名，以及所存张洽刻书识语，知是张洽于南宋绍定二年（1229）通判池阳时所刻，即所谓的池州本。

此本钤有“昆山徐氏家藏”、“乾学之印”、“健庵”、“汪士钟藏”、“长洲汪骏昌藏”、“骏昌”、“雅庭”、“杨以增字益之又字至堂晚号冬樵”、“杨以增印”、“东郡杨氏鉴藏金石书画印”、“东郡杨氏宋存书室珍藏”、“宋存书室”、“杨绍和审定”等印记。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（唐）韩愈撰 宋刻本（卷五至七、十七至二十四、外集卷一至十配清抄本）。框高19.8厘米，宽14.3厘米。每半叶十二行，行二十一字，小字双行同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

《昌黎文集》的最早编辑者，是他的门人李汉。书前李汉《文集序》称：“长庆四年（824）冬，先生歿。门人李汉辱知最厚且亲，遂收拾遗文，无所坠失，得赋四，古诗二百一十，联句十一，律诗一百六十，杂著六十五，书、启、序九十六，哀辞祭文三十九，碑、志七十六，笔砚鳄鱼文三，表、状五十二，摠七百一十六，目录合为四十卷，目为《昌黎先生文集》，传于代。又有《注论语》十卷，传学者；《顺宗实录》五卷列于史书，不在《集》中。”这就是说，韩愈文集之编始于长庆四年冬先生歿后；编者是先生门人李汉，汉与愈既知且厚且亲，对先生为人及著述情况最为了解；因而收拾先生遗文，“无所坠失”。这几点最值得称道。所以自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以降，直至《郡斋读书志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题》，乃至后世的各种目录，关于韩昌黎先生的文集，几乎都是四十卷的规制。至若后来又有什么

《集外文》、《外集》等出现,那已是宋朝人辑佚补缀而成。

宋刻韩昌黎文集,至今仍有几个不同的传本,各有短长。此属宋蜀刻唐人文集本。传世宋蜀刻唐人文集有两个系统:一为十一行本,约刻于南北宋之际,今存骆宾王、李太白、王摩诘,日本尚藏一种,凡四集;一为十二行本,约刻于南宋中叶,今存世者尚有十九种,其中就包括《文集》四十卷《外集》十卷的《昌黎先生文集》。十二行本蜀刻唐人文集,书中光宗赵惇御名“惇”字及嫌名“敦”字皆缺笔避讳,此本“敦”字即缺笔,表明其刻已届南宋中叶。勘核现存这个系统的蜀刻唐人文集,其版式行款、字体风格、印纸墨色如出一辙,因疑其为断代总集丛刻之散出者。据程有庆考证,宋王楙《野客丛书》卷五,出现了《唐六十家诗集》一名,但未说明由谁在什么地方出版。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·王右丞集》提要亦称:“建昌本与蜀本次序皆不同,大抵蜀刻《唐六十家集》多异于他处本。”王楙生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(1151),卒于南宋宁宗嘉定六年(1213),福州福清人,所著《野客丛书》分门类聚,钩隐抉微,考证经史百家,下至骚人墨客,佚草佚事,细大不捐。所记《唐六十家诗集》,在他下世前十七八年已经行世,当为亲眼所见。陈振孙晚他三四十年,但是著名的目录学家,其所谓“蜀刻《唐六十家集》多异于他处本”之说,绝非无稽之谈。这就证明南宋中叶四川眉山地区的确刻过一部《唐六十家集》。直到明代杨士奇等核编的《文渊阁书目》,其卷十仍著录两部残宋本《唐六十家诗》,说明历史上确曾有过《唐六十家集》丛刻行世。这个问题一解决,现存宋蜀刻十二行本系统唐人文集的版本问题便迎刃而解了。此本《昌黎先生文集》便是其中的一种。因此,此本亦可定为“南宋中叶四川眉山地区刻唐六十家集本”。

此本钤有“翰林国史院官书”、“以增私印”、“东郡杨绍和字彦合藏书之印”、“杨保彝藏本”、“东莱刘占洪字少山藏书之印”等印记。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音注韩文公文集四十卷外集十二卷 (唐)韩愈撰 (宋)祝充音注 宋刻本。框高17.1厘米,宽12.1厘米。每半叶十二行,行二十一至二十二字不等,白口,四周双边。

此书编法,正文四十卷,与其他传本无异,外集则与遗文传序合编,通作十二卷,故称《外集》十二卷。与其他传本所不同者,有了祝充的音注。祝充字廷实,文溪(水名,在今宁波南四十里,宋时隶两浙东路)人。其他行实无考。

今据以影印的这个版本,刻于何时何地,书中无直接的证据。万曼《唐集叙录》在介绍此书时,引证了一段张允亮的跋文,足资参考。跋称:“右宋本《音注韩文公集》四十卷《外集》十二卷。‘敦’字减笔,避光宗嫌名,绍熙时刻也。槧印精良,字画方整,望而知为浙刊。注文专研训诂,简当有法。惜未注撰人姓氏。以方氏《韩集举正》勘之,与所举浙本有合有不合。后取《五百家昌黎先生集》对校,则所采文溪祝氏说与注皆同。惟魏氏集取诸家,不无删节,遂不若原注之详尽耳。祝氏名充,字廷实。文溪,水名,在明州南四十里,隶两浙东路。此为祝氏原刻,仍浙本也。”这段跋文颇有见地,第一,根据书中讳字,断定其为南宋绍熙间(1190—1194)刻本;第二,根据印纸墨色、字体风格,进一步断定其为浙江地区刻本;第三,审定其为祝氏原刻,而祝氏乃文溪即四明人,因而仍属浙刻。今细审此书版式、字体、刀法、印纸、墨色等风格特点,则张氏之说仍不失为可信的鉴定意见。故此书的版本似可定为“南宋绍熙四明刻本”。此本传世孤罕,洵为珍贵。

此本钤有“知止堂”、“知足不辱知止不殆”、“陈寅之印”、“瞻缘堂”、“吴郡潘寅叔藏书印”、“潘氏寅叔珍藏”、“李印长英”、“静虚楼”、“陈淳私印”等印记。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 (唐)韩愈撰 (宋)廖莹中校正 **朱子校昌黎先生集传一卷** 宋咸淳廖氏世彩堂刻

本。框高20.4厘米,宽13.7厘米。每半叶九行,行十七字,小字双行同,细黑口,四周双边。

《昌黎先生文集》的传本很多,此本是南宋咸淳年间(1265—1274)廖莹中世彩堂刻本。廖莹中字群玉,号药洲,邵武(今属福建建安)人。尝举进士,却为奸相贾似道门客,专为典理图书。尝除太府丞,知某州,皆不赴。咸淳间,尝命工翻刻《淳化阁帖》和《绉帖》,十分逼真。由他来校正《昌黎先生集》并主持镌刻,其精到可知。《藏书纪事诗》引证《持静斋书目》说:“《韩昌黎集》,宋廖莹中世彩堂精刊本。相传刊书时用墨皆杂泥金香麝为之。此本为当时初印,纸宝墨光,醉心悦目。”莫氏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》谓:“明东雅堂翻刻世彩堂《韩文》,一仍旧式而不著其所从来。今观此本,每叶中缝下截悉有‘世彩堂’字,徐氏悉以‘东雅堂’易之。纸墨精好,字体在欧、褚间,徐尤未能毕肖也。”今检此本,确如莫友芝所说,每叶版心下端镌刻“世彩堂”三字,且于每卷末尾镌刻篆书或隶书“世彩廖氏刻梓家塾”牌记,这是此书刻于廖氏世彩堂的有力证据。周密《志雅堂杂抄》和《癸辛杂识》谓廖刻诸书,用江西抚州草钞清江纸,造油烟墨印刷,此书即如此。由于此书字体隽秀,刀法剔透,纸质莹洁,历来被藏书家誉为传世的无上神品。

此本钤有“项笃寿印”、“项氏万卷堂图籍印”、“四陶居”、“少谿主人”、“汪印士钟”、“杨宝彝印”、“海源残阁”、“四经四史之斋”、“聊城杨承训鉴藏书画印”、“郇斋”、“祁阳陈澄中藏书记”、“伯郊过眼”等印记。表明此本自明代以来就递藏有绪。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 (唐)柳宗元撰、童宗说音注 (宋)韩醇等注释 魏仲举辑 宋刻本 黄丕烈跋并题诗。框高20.6厘米,宽13厘米。每半叶十行,行十八字,小字双行,行二十三字,细黑口,左右双边。存十一卷(卷十六至二十一、三十七

至四十一)。

柳宗元(773—819)字子厚,唐河东解县(今山西运城西南)人,世称“柳河东”。唐德宗贞元九年(793)擢进士第,十四年又登博学宏词科。授集贤殿正字,调蓝田尉,拜监察御史里行。与王叔文友善,及王叔文主政,擢礼部员外郎,参与革新政治。叔文败,宗元被贬永州司马。宪宗元和十年(815)徙柳州刺史,故人称“柳柳州”。时刘禹锡亦遭贬播州,宗元以播州非人所居,且禹锡母老,于是具奏以柳州让禹锡,而自己往播州;会大臣亦为禹锡请改他地,遂赴连州。宗元在柳,多有惠政,故卒而百姓追慕,至立祠享祀。详见两《唐书》本传及傅璇琮主编之《唐才子传校笺》卷五。

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谓柳宗元“公天才绝伦,文章卓伟,一时辈行,咸推仰之。工诗,语意深切。发纤秣于简古,寄至味于淡泊,非余子所及也。司空图论之曰:‘梅止于酸,盐止于咸,饮食不可无,而其美常在酸咸之外,可以一唱而三叹也。子厚诗在陶渊明下,韦应物上。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,而温厉靖深不及也。’”

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柳宗元集》三十卷,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同。《郡斋读书志》卷十七著录《柳宗元集》三十卷《集外文》一卷,卧云本《郡斋读书志》则作《柳宗元集》四十五卷《集外文》二卷。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十六著录《柳柳州集》四十五卷《外集》二卷,并谓:“刘禹锡作序,言编次其文三十二通,退之之志若祭文,附第一通之末。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,非当时本也,或云沈元用所传穆伯长本。”可证四十五卷本是宋时通行的版本。

童宗说字梦弼,号南城先生,唐南城(今河南孟津县东黄河南岸)人。其人眉宇秀整,操尚拔俗,为袁州教授。曾为柳文作音注。

韩醇字仲韶,宋邛州临邛(今四川邛崃)人。曾著《韩集全解》及《诂训柳宗元文集》。

为柳《集》作音辨者是张敦颐。敦颐字养正,宋歙州婺源(今属江西)人。南宋绍兴十八年(1148)进士,初为南剑州教授,后历

知舒、衡二州。有《柳集音辨》行世。

魏仲举，名怀忠，仲举盖是其字，福建建阳人，知名书估。南宋庆元六年（1200）魏仲举以书坊之力编辑刻印《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》和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》，因此名扬坊肆。其所辑刻的《韩集》正集目录后据《天禄琳琅书目》记载有“庆元六祀孟春建安魏仲举刻梓于家塾”牌记，是《韩集》为魏仲举所辑刻的直接证据。此本《韩集》今藏南京图书馆，但此牌记已脱。而《柳集》编刻的时间当与《韩集》同时，其证据有三：一《韩集》目录前载有引用书目二卷，题为《韩柳先生引用书目》，可证两书是作为一个整体同时编刻的，否则不会如此开列引用书目；二据《四库全书总目·柳集》提要称《柳集》“版式广狭，字画肥瘠，与所刻《五百家注昌黎集》，纤毫不爽，盖二集一时并出也”；三此集所存各卷卷端及卷尾题名多为“新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卷第xx”，其中“辨”字亦有作“辩”者。题名方式亦与《韩集》同。据此，则知《柳集》亦当为庆元六年建阳魏仲举家塾刻本。至于所题“五百家注”，两书注者均未足五百家。之所以要题五百家，乃是广告性质的宣传，目的是为拓展市场，扩大营销，牟取利润。此书刻印精当，字体颇具柳公权风韵，墨如点漆，典型的建本风貌。

钤有“铁琴铜剑楼”、“稽瑞楼”等印记。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河东先生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（唐）柳宗元撰（宋）廖莹中校正 宋咸淳廖氏世彩堂刻本（卷三至五、十配影宋刻本） 朱彝尊跋。框高20.7厘米，宽13.7厘米。每半叶九行，行十七字，小字双行同，细黑口，四周双边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柳《集》提要谓：“宗元《集》为刘禹锡所编，其后卷目增损，在宋时已有四本：一则三十三卷，为元符间京师开行本；一则曾丞相家本；一则晏元献家本；一则此四十五卷之本，

出自穆修家，云即禹锡原本。……要之，刻韩、柳《集》者，自穆修始，虽非禹锡之旧第，诸家之本亦无更古于是者矣。”可证这个四十五卷本，当是传世的古本之一。关于刘禹锡编次柳《集》事，世彩堂本有刘氏序言可证。序称被贬谪的“柳州刺史，五岁不得召归，病且革，留书抵其友中山刘禹锡曰：‘我不幸，卒以谪死，以遗草累故人。’禹锡执书以泣，遂编次为四十五通，行于世。”四库馆疑刘序“四十五通”之说，是后人所改。

现在据以影印的底本，是南宋咸淳（1265—1274）年间经廖莹中校正，并由其世彩堂刻印的版本。此书乃其校刻韩、柳集当中的柳集，版式行款，字体风格均与韩集同。目录及各卷后均镌篆书或隶书“世彩廖氏刻梓家塾”八字牌记，每叶中缝下端镌“世彩堂”三字，这是此书为廖氏世彩堂刻本的直接证据。周密《志雅堂杂抄》和《癸辛杂识》称廖刻诸书用江西抚州草钞清江纸，造油烟墨印刷者，即指此韩、柳集。此本写刻精美，世无二帙，在宋版书中向被推为无上神品。

此本钤有“项笃寿印”、“项子京家藏”、“项墨林收藏秘笈之印”、“项元汴印”、“项氏万卷堂图籍印”、“项墨林鉴赏章”、“牧翁审定”、“陈氏澄中藏书”、“陈印清华”、“郁斋”、“天籁阁”等印记。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国家图书馆